



从前,我们讨论“啃老族”,也许你会对“啃老”的人表示不屑,但有一群人却在内心里默默地羡慕着他们,他们被人称作“老啃族”。

“老啃族”出身农村,带着全家人的希望,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,通过读大学迈进城市的大门。然而,憧憬中的生活刚刚开始就发生转折,养育之恩化为亲情利润,一句“报答”,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种种局面。

如今的“老啃族”,则更多了一份时代发展的印记:都市白领、公务员、大学生……种种让家乡人艳羡的光环,让他们无法面对现在可能农民工都比自己收入高的现实;工作再难找,也无法放下面子去从事与“身份”不符的职业;日新月异的城市消费方式,让他们分分钟就变身成各种“奴”,房奴、车奴、卡奴、孩奴……但即便再难,他们也是不能或是不愿去诉一声苦的,因为他们是农村父母千辛万苦供出来的大学生。最终他们只能将苦涩一再掩盖,扬起笑容,继续应对“反哺”——反哺父母,反哺兄妹,甚至反哺曾经生活的村庄……所以,与其说他们是“老啃族”,不如说他们更像一群疲惫的“反哺族”,身在追梦路上,却走得步履沉重……

“反哺”无处不在,昔日寒门学子的爱与哀愁——

怎样报答才算感恩啊,我的父老乡亲

反哺族,更多的是描述一种生活状态。他们通过寒窗苦读走出了农村,但主要的亲属关系、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;他们生活在城市,却将自己很大的经济收入“反哺”给了老家。做城市的人,操故乡的心;人在城市,但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。背负着对父母的亏欠、农村“泛家族关系”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,他们犹如陀螺,不停旋转。

光荣在家乡,寂寞在城市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凌晴

3104元——我下意识地做了个加法。
正月初七,从岳阳的小山村,回到北京那栋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部委大楼,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今年2月份的工资条——3104元,便是这个月的实发收入。

我叫王朗(化名),今年30岁,是中央某部委一名试用期未满的普通公务员。即便如此,家乡人却早已认定,我是个祖坟冒青烟的“通天”人物。如此高的评价,让我在面对父亲想要建房的希望时,只能选择倾尽所有——尽管我因此而在物质的压力下动弹不得,行在宽阔的北京大街,生活却显得格外狭隘。

水涨船高的建房愿望

大年初六,家里喜气洋洋。在刚刚建成的新楼房里,我年近六旬的老父亲风光光地迎娶了我的后妈。

去年,这栋让父亲喜笑颜开的新房还只是一栋破旧的泥砖房。曾经,做小包工头的父亲赚了一些钱,家境在当地还算可以。可是,父亲好赌,甚至将姑奶奶辛苦攒给我的学费全部扔上赌桌;他打骂母亲,最终换来夫妻离异的结局。然而,父亲又是不幸的,一场交通事故导致他左肩肩骨与锁骨开裂,失去了干重活的能力,也让他的风光成了过往。

光成了过往。

在我在外求学的那些年,家里的泥砖房渐渐破败,而左邻右舍间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的新房,让父亲有些坐立不安。我想,他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。

所以,当父亲提出要新建楼房、希望我能分摊几万元钱时,我二话不说,拿出了自己从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积攒的大半积蓄——父亲数着钱,露出了一种终于熬出头的表情。而作为儿子,无论如何,我都觉得这是一份应尽的孝道。

不料,随着工程推进,父亲东

家看看,西家瞧瞧,“取经”之后,眼光就高了起来。他时不时给我吹风:“隔壁王爹家的窗户用的铝合金,配钢化玻璃,比木制的窗户好很多。”“宋族屋里的电视机是买的液晶平板的,钱都是他家小儿子出的。那个后生仔在广东打了几年工而已,一副赚了很多钱的样子,其实哪里有我儿子本事大!”……

就这样,原本10万元的建房预算,一下子水涨船高飙升到了20多万。面对父亲这样那样的明示或暗示,我只得倾尽所有,先后掏出12万元,全部投入到建新房才算完事。

父亲的骄傲背后是我的无奈

给父亲建房的钱超过预期,这也让我在北京的生活全面告急。

2014年1月21日,春节前一周,因为一再拖欠5000元房租,房东向我下了最后通牒:不给钱就搬!

当时的我苦笑着摇头——一分钱压垮英雄汉,家乡的父亲大概怎么都想象不到,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正在遭受这样的尴尬。

端着国家公务员这个看似旱涝保收且风光无限的“铁饭碗”,别人羡慕,但也只有“城内人”,尤其是年轻的公务员,才能真真切切体会到其中的不易。

2009年,我从湖南省的一所一类院校研究生毕业后,考入了乡镇基层,自己艰难打拼,随后走到了市委机关。在而立之年时,我又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,考进了中央机关——也许这份成长值得我的父亲在邻居面前炫耀好久,但事实是,我目前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:收入仅够糊口,没车没房没老婆,9人合租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。

房东催租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。我犹豫再三,只好跟朋友开口借来5000元。揣着这笔“救济款”,走在灯火通明的长安街,我心里有

种说不出的委屈。光鲜亮丽的北京,我却始终无福享受。偶尔我会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、有存款的年轻人,他们有的是“啃老族”,刚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,有的即便不“啃老”,也能够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,旅游、购物、娱乐随心所欲。而我,做着城里人,操着农村的心,动辄就是“不孝”,想拒门而不得,有难更是不能诉。

而此时,家乡的新房已经建好,不仅舒适,还相当体面,洗衣机、电冰箱等家电都是“高配”的。父亲说,他很高兴。

最终我也只是打着哈哈能推就推。

最让我吃惊的是,父亲竟然瞒着我,一口应承下替远房表叔找工作的事,还收了人家一个3000元的红包!后来,我找到父亲晓之以理,他才将红包退回去。但我仍然在后怕——顶着家庭最大希望的光环走出去,要承担额外的经济压力是一回事,但如何面对家乡人复杂的亲情追索、如何面对他们飘飘说出的一句“帮个小忙”,似乎我要学习和承受的都还很多。

我无言以对。

回顾今年的春节长假,总是有完全陌生却无比热情的面孔凑到我的面前,而寒暄的话题,无外乎是儿子要进学校,侄子要找工作等等。他们觉得,国家部委——多么不得了的地方,那解决他们的这些“小要求”,也应该只是一包烟、一杯酒那么轻松的事。我只能苦笑,却怎么都说不出一个“难”字——其实潜意识里,我也不愿意丧失那一份让人愉悦的骄傲感。所以,

“帮个小忙”,其实尴尬

而替后妈的女儿找工作,则是年前父亲强行给我下达的任务。

我立马联系我这个“新妹妹”,要她拿一份详细的简历给我。我想着,接下来或许能找熟识的朋友或同学试一试,替她搭搭桥。

拖了二十几天,我才收到她的简历。她今年23岁,职高毕业。对新工作的要求,不多,只有两点——挣得多,干得少。

收到简历的第二天,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,问我找好没。

吃上“国家粮”后,亲戚从此成“债主”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李旦

2013年年底,一大家子人围在我父亲床前,不停地抹眼泪。我站在最里面,气若游丝的父亲盯着我,艰难地说:“我和你妈有4万元存款,但这钱得给你妈养老和孙子读书用,所以我的安葬费由你出来。”

交代完后事,父亲走了。还没来得及宣泄心中的悲伤,“钱”的问题便不合时宜却迅速地被提了出来——在父亲咽气的这间房里,我和弟弟妹妹的争吵开始了。

“为什么又要我来出?安葬父母本来就是儿子的事!”

“你是吃‘皇粮’的,你不出谁出!爸爸死前都交代清楚了,你不出就是不孝!”……

激烈的争执,让我的眼睛里不再有泪水,转而生出了愤怒。

我叫孙群娥,双峰县甘棠镇人。虽然我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,但其实这种遇事就理所当然由我来拿钱的情况,我实在遇到太多次了。

25年,始终为他人奔忙

我是家里的老大,再加上成绩一直不错,父母砸锅卖铁就把我一个人供上了大学。毕业后,正好父亲退休,我便顶了父亲在车站的职,吃上了“国家粮”。也许有人要说我幸运,因为我是兄妹几个里唯一一个走出黄土地的人;再说得重点,我捧起的这个“铁饭碗”,背后都是我家人的付出——尽管很多时候,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。

自从我上班开始,接济家里便成了我不可推却的“天职”。可是,我那点微薄的薪水很快便跟不上家里人水涨船高的需求。

2006年,家里建新房,我出了15000元;2008年弟弟娶媳妇,在我这借走一万,只还了5000元;2010年,妹妹的孩子在双峰县城读书,一直在我家吃

住,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;2011年,父亲患了肝癌,在医院治疗花了4万多元,我出了一半。朋友间人情往来送的烟酒,父母看到就立刻惦记上:“你家里的烟酒要是多得没地方放了,就带一些回来给你弟弟。”但人家送的礼其实都是欠的人情债,到最后,我还得自掏腰包去还人情……这样的小账算不完,而更多的时候,明明不应该由我独自承担的,也成了我的分内事——比如父亲的安葬费。而这一切的理由,就仅仅因为我吃“国家粮”。

我如同家人的自助银行,没钱就找我,要钱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弟弟妹妹问我要钱都是理直气壮,好像这是我欠他们的;而且他们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,钱来得轻松简单,而他们挣的辛苦钱花一分出去都得肉疼。如果我不同意给,我妈就会站出来说:“现在在你条件好点,你应该帮他们一把。再说,家里只把你一个孩子送出去了,你爸的工作也是由你接班的,弟弟妹妹心里肯定有想法。你大度一点,就当这钱是给我和你爸了。”从20岁参加工作到如今45岁,我一直在不停地给家里钱,而且数目越来越大。到后来,连没什么来往的堂叔也来跟我借钱。如果我不借给他,他便有充分的理由一直记恨——农村自有一套令人头大的人情逻辑,而且几乎让人没有说不的机会。

(下转 A05 版)

